GLOBAL DIALOGUE



Matteo Bortolini, Riccardo Emilio Chesta, Andrea Cossu, Flaminio Squazzoni, Aliakbar Akbaritabar, Annalisa Murgia,

意大利社会学

全球对话"

年出版4期,以17种语言刊出

Martin Albrow

Barbara Poggio, Massimiliano Vaira

科索沃的殖民遗绪

全球时代的结束?

Ibrahim Berisha

Steve Matthewman, Holly Thorpe, Elizabeth Stanley, Dylan Taylor, **Robert Webb**

奥特亚罗亚社会学会學

特辑

> 纪念ISHWAR MODI

>介绍土耳其编辑团队







> 主编的话

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 回想我与 ISA 的因缘际会这十年来,对于以民族 国家为主的社会学内容和形式感到很震惊。我们 有国际的社会学,以 ISA 为代表,还有许多研究 委员会、主题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然而,这些都有着 国家或是地区的特征。聚集社会学家在一起的通常是国 族的因素而非全球的。我们有全球社会学,但是要有个 全球的社会学社群是更难达成的,数字时代也是如此。 许多我们面对的问题,像是难民、移民、气候变迁、金 融资本、高等教育的商品化等,都有全球的面向,而即 使我们会研究这个面向然后拓展这方面的理论知识,要 形成一个全球社会学社群是很有挑战性的。这部份是因 为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导致; 部份也是因为公民社会一社 会学的立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要跨过高等教 育也是很难的,因为其相当阶层化,各国情况又不一致, 虽然我必须要说的是,学科的不平等在国家理和国家之 间是一样很深的。的确, 只要有的全球社群在, 那这个 社群就是由那些具有资源和移动力的人所组成的,也因 此把他们和在地的资源分隔开来。

这期我们有两个很不同的社会学发展故事。意大利社会学在历史上被巴尔干化,被教会、共产党、社会党所分据,也因为长期的南北分裂所导致。若意大利的政治学已经因为和法西斯主义有关而名声扫地,那意大利社会学也被左翼激进的红色旅的关系而不受欢迎。纽西兰的社会学则和英国的社会政策传统有关,并且和殖民遗绪对抗奋斗,这个小岛国惧怕着其强大的邻居澳洲。

总之,全球化对社会学的影响被国家历史和堡垒所中介了。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对于该国的社会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Ibrahim Berisha 的访谈强调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的被殖民经验,Martin Albrow 的访谈则聚焦在英国的全球影响。

我们失去了一位对于整合国家和全球社会学的重要推手之一 Ishwar Modi。他是《全球对话》的印度翻译和编辑,也是休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学者。他将会被怀念,其计划会被继续下去。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u>ISA website</u>。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v.edu



意大利社会学家讨论在意大利为社会学而奋斗的故事。



Martin Albrow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描述自己迈向全球化研究的经历。



Ibrahim Berisha描述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被殖民经验。



奥特亚罗瓦社会学家讨论各种社会学的介 λ.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 社提供贊助。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副主编

Gay Seidman.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Mina Azizi, Vahid Lenjan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taka Eguchi, Izumi Ishida.

哈萨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r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ł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ą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Crăciu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exandra Isbăşoiu, Rodica Liseanu, Anda-Olivia Marin,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nastasia Daur.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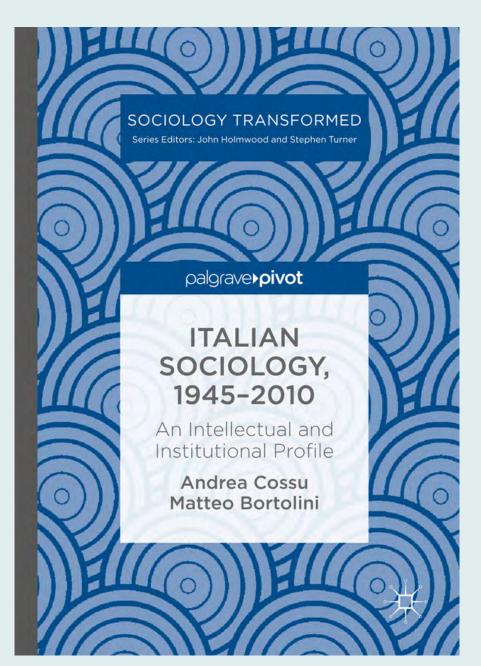
> 本期內容

主编的话: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2
> 意大利社会学	
21世纪的意大利社会学	
Matteo Bortolini, 意大利	4
葛兰西: 意大利熟悉的陌生人	
Riccardo Emilio Chesta, 意大利	6
双面的意大利社会学, 1945-1965	
Andrea Cossu, 意大利	8
国际化意大利的社会学, 1970s-2010s	
Flaminio Squazzoni 和 Aliakbar Akbaritabar, 意大利	10
意大利社会学的性别偏见	
Annalisa Murgia, 英国, Barbara Poggio, 意大利	12
被宰制的学科: 意大利学术界中的社会学	
Massimiliano Vaira, 意大利	14
31 mg / 31 11 33 34	
>世界各地的访谈	
全球时代的结束? 访谈Martin Albrow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和 Diana-Alexandra Dumitrescu, 罗马尼亚	16
科索沃的殖民遗绪: 访谈Ibrahim Berisha	
Labinot Kunushevci, 科索沃	19
> 奥特亚罗亚社会学会	
Ōtautahi后灾难时代的新政治	
Steve Matthewman,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22
后灾难地理的创意运动	
Holly Thorpe,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24
无声无息的虐待	
Elizabeth Stanley,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26
社运与学术	
Dylan Taylor,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28
迈向原住民犯罪学	
Robert Webb,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30
> 纪念ISHWAR MODI (1940-2017)	
醉心于休闲研究	
Rajiv Gupta, 印度	32
鼓舞启发人心的源头	
Karl Spracklen, 英国	34
、林相	
> 特辑	
介绍土耳其编辑团队 Cil Carbona Win 和 Immala Furnan In Edit	
Gül Çorbacıo ğ lu 和 Irmak Evren, 土耳其	36



> 21世纪的意大利社会学

Matteo Bortolini, University of Padova, 意大利



刚出版的《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作者为Andrea Cossu和Matteo Borolini。

同我和 Andrea Cossu 在 «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 An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Profile》一书中所论证的,1990 年代早期是英雄时代的结束,具 有领袖魅力的社会学家比较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社会学家, 这以被称为是一种"没有标准的 例行化",社会学家对于议题、 方法、理论没有共识, 这影响到 的日常的学术实做, 也影响了许 多人,像是意大利或是外国的社 会学家,全国性或是地方性的政 治精英, 社会和宗教运动, 经济 行动者,大众媒体。此外,这也 防止了一种共享的社会学社群的 视野的产生,没有共享的专业或 是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愿景。社 会学挣扎要去重建自己的现在, 过去,未来。过去的"战后社会 学的重生"和"1968年学生反叛" 的神话对于年轻世代来说是很难 理解的 (见Chesta和Cossu的 本期文章)。

可以确定的是,就像许多人 发表在《全球对话》中的文章指 出的,这个社会取径与研究的多 元化已经在过去30多年来在每 个地方都进行中。在意大利,由 于特殊的历史让这个后现代分化 多了一点意大利的特殊味道。过 去 15 年来,全球的高等教育新自 由主义转向、管理和市场的意识 形态、对于学术专业的战后评量 方法, 三者已经削弱了意大利三 个学术同时也是政治阵营(componenti): 罗马天主教、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同时, 年轻学者 被鼓励去拓展地理上、知识上、 专业上的视野,许多社会学家到 国外留学,或是做博士后,参加

国际会议,成为全球学术网络的一员。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许多社会科学家放弃的意大利文作为主要的出版语言,远离本土学界,让意大利社会学越来越不可能可以达成实践或是想象上的共识(见Squazzoni和 Akbaritabar 的本期文章)。

除了这些动态,意大利社会 学主要面临的三个挑战:社会学 在国家的文化和知识地图中的位 置,在社会科学以及新自由主义 学术体制中的角色,以及其制度 和组织的基础。

一个意大利社会学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缺乏国家的社会想象(见 Vaira, Murgia 及 Poggio 本 期 的文章)。早期世代那些具有魅力 的社会学家往往是有名的政治人 物或是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晚期 世代的社会学则影响力逐渐式微。 一方面, 意大利人对于从 1968 到 1970年代的记忆就是社会学家是 一群党派分子和不可靠的知识分 子 (University of Trento 的校 友加入了恐怖组织以及其他社会 学家领导的新左派组织),这个看 法现在还被逐渐强化。有些社会 科学家被认为有强烈意识形态, "有机知识分子",或是政治运 动, 工会、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言 人。另一方面,从1980年代开 始, 社会学家被批评太过招摇, 像是 tuttologi (什么都懂的 人)。虽然年轻世代的社会学家有 许多是有名的知识分子, 像是 1vo Diamanti, Mauro Magatti, 和 Giovanni Semi (其2015年的书 《Gentrification》引起广大回 响),但是社会学整体的形象重建 还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

学术社会学的命运仍然和意 大利的高等教育体系紧密连结图 一起。2004-05年间,国家资 国家的生活图 要收集、分析、评估学术少数 以生结果有少数等 的影响,但是整体的图像所呈现的 是黯淡的,也就是意大利以时 会学开始被迫要去改善以出版研 究的质量。后来,新自由主义的 Berlusconi 政府引进了激进且争议的意大利高等教育改革(law 240/2010),造成了学科间和学科内于 2012 年晚期高度整论此改革。ASN (国家的科学质量评量)所出版的结果中引进了一个新的聘用方式:只有 1/5 的人会晋升到副教授或是正教授的职位。此外,北意大利的大学表现要好,所以比较多人可以升等。

结果关于区域和次领域不平等、三个学术阵营的权力、学科的分化的辩论可说相当激烈。其中一个最争议的点是 law 2010 所规定的评量指标,这个指标不成比例地奖励了研究型的学者。国外的出版品都会被奖励,但是教学和服务则否。平均而言,发且胜过了其他在地导向的学者。

最后,对于2010改革的争 议对于意大利社会学会 (AIS) 有 个很大目非预期的影响, AIS 在 1983年成立,是一个给三个阵 营去分配学术位置和研究资金的 平台。该学会逐渐丧失了名声和 吸引力,ASN的报告出炉之后让 许多社会学家退出该学会。因为 会员数目创新低, 所以学会想要 强化自己的公共角色和学科号召 力。同时,经济社会学家因为表 现比较好, 也抛弃的社会学会, 自己成立了意大利经济社会学会 (SISEC),举办自己的会议,有 220 人报名, 这是 1/10 的意大利 社会学家的数目。时间会告诉我 们这样的双重学会是否可行,或 是这会上意大利社会学可以进入 下一个历史阶段。

來信寄給 Matteo Bortolini <matteo.bortolini@unipd.it>

> 萬兰西

意大利熟悉的陌生人

Riccardo Emilio Chest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iesole, 意大利



葛兰西

当代社会科学的辩论中,批判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像似物。事实上,他们的关系不是不证自明的。战后意大利社会科学的重建完美地说明了对于社会的研究所进行的霸权斗争,也是一种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冲突。

我用霸权的概念不是刚好而已,因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科学的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可以追溯到葛兰西。从葛兰西的哲学背景到其策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化,以及葛兰西作品被意大利共党的挪用,这些都造成了葛兰西和意大利社会学之间的疏远。相较于国际社群对于葛兰西的接受度,葛兰西在其本土故乡意大利可说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 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唯心论

在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中,葛兰西遭遇了其时代的重要知识分子们,包括那不勒斯哲学家Benedetto Croce,其理论和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前期是很可观的。事实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最多引用的作者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而是Croce。

Croce 作为历史唯心论的拥护者,拒绝了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存在,投入到了认识论的推论中,去证成法律的重要,拒斥社会学的可能。葛兰西知道这个局限,特别是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哲学的前提下,他还要求一种"反 Groce"的意大利文化运动,要克服唯心论和精神的霸权。同时,《狱中札记》和当时的社会科学有重要的对话,虽然是从批判的角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社会科学的严谨研究的重要性。

>Togliatti 的葛兰西

为了要去了解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何 以及如何采用了一种秘密唯心的葛兰西诠释路 线,我们不能简单的把重点放在其著作而已。 我们必须要去看葛兰西著作的脉络, 主要是那 些 1937 年身陷于法西斯囹圄之中的作品,像 是《狱中札记》只有在死后才出版,并且是由 葛兰西的老友 Palmiro Togliatti 所收集的, 他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 其和共产党的 记者 Felice Platone 一起编辑该作品。第一 版把葛兰西的著作分成许多册,包括1948年 的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 和 1949 年 的 Intellectuals, Il Risorgimento 和 Notes on Machiavelli。Togliatti 和 Platone 把 葛 兰西呈现为意大利文化传统的传人,重建一种 理想知识分子的系谱学,包括了 De Sanctis, Spaventa, Labriola, Croce, 以及最后的葛 兰西。同时,一个清楚的文化霸权策略被一个 特殊的"新马基维利主义"所实践了,使用了 葛兰西对于大众政党形成的分析, 或是葛兰西 所谓的"现代王子"。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诠释框架有

个双重目标。首先,葛兰西被连结到 Groce 和历史唯物论,正当化了共产党的文化。第二,他的知识遗产必须要被转型成为支持新马基维利主义的历史运动方向,Togliatti 是党的领导,而党则是带领伟大工人阶级航行前进的历史舵手。透过这样的整合,葛兰西被诠释成是一个代议民主的社会运动领袖。是一个进步布尔乔亚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对于受压迫者有兴趣的学者,并且是一位历史唯物论者,否定社会科学有任何的价值而言。

> 失落的环节

在1950年代,葛兰西的作品变成了一整世代知识分子寻求开创一个左翼布尔乔亚的重要理论工具,并且批判新的社会科学为一种"资本家的工具",主要从美国引进的,试图要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去削弱工人阶级。事实上,意大利的社会学主要支持者是一个企业家Adriano Olivetti,其聚集和资助了技术专家和社会党的知识分子。在他位于Ivrea的工厂,Olivetti开启了"社会关系部门",其年轻学者或许研究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并且应用到工业关系之中。

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干部领导仍然对于 01-ivetti 的"共产党企业"的计划有所质疑,认为那是资本家防止阶级冲突的一种技术官僚导向的方式。在一篇发表于 I1 Contemporaneo的官方期刊的文章中 (1955 年 9 月),共产党知识分子 Fabrizio Onofri 清算斗争 01ivetti的文化的政治运动路线,认为那是弥赛亚主义,定调 01ivetti 为阿拉,把其右手的社会学家 Franco Ferrarotti 看成是 01ivetti 的先知穆罕默德。1950 年代的官方葛兰西主义变成了历史唯心哲学,建立在固定的理论预设上面,没有经验基础,而只是 Togliatti 的"进步民主"的操作手册,亦即要去在意大利民主制度下去赢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另外一个对于葛兰西的诠释开启了新的批判左翼团体,称之为意大利共产党(PCI),这发生于两起事件之后。第一是在1955年,FIAT工厂(工人阶级运动的中心)的工会内部选举结果令人惊讶万分,CGIL,也就是意大利主要左派的工会和PCI最强大的以工厂为基地的盟友,其得票少掉了一半。一年之后,苏联

对于 Budapest 的抗议的镇压则激起了潜藏已久的怨恨, 机起了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辩论, 而许多知识分子则愤而脱党。

然而, 当年轻、热情的知识分子(包括 Raniero Panzieri 所领导的 Quaderni Rossi Raniero Panzieri) 开始挑战在50年代被制 度化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他们转向了一种社 会学研究的战斗模式,也就是 inchiesta operaia (工人阶级的研究), 批判 Togliatti 对于葛兰西的诠释。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真正 对于葛兰西有什么新的发现,事实上,只有在 1967年葛兰西学院鼓励社会学家去发掘葛兰 西的贡献, 但是那场对话并没有真正开启什么 学术研究。而且虽然1968年的反叛帮助了更 新了批判社会学,引进了法兰克福学派,多数 的专业社会学家是闪避掉了批判理论的路线。 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巨观社会学的衰落之 后, 葛兰西似乎只是哲学史中的一个人物而 己。

这边有个吊诡:意大利的专业或是公共社会学不论在诞生或是巩固时期都可以有遇到"真正的葛兰西"。当世界其他地方,不管是美国、英国、拉美、印度,葛兰西的理论都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工具让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被压迫人民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但是在意大利,葛兰西的贡献都被专业社会学家或是批判社会学家忽略,这让葛兰西成为了意大利最熟悉的陌生人哪。■

来信寄给 Riccardo Chesta <riccardo.chesta@eui.eu>

> 双面意大利社会学 1945-1965

Andrea Cossu, University of Trento, 意大利



Franco Ferrarotti是意大利专业社会学的创始者之一。

1960年代之后,而那时候起社会学家开始被学院接受。

意大利对于社会学制度 化过程的反省通常围绕在知识位置的历史。如 Matteo Bortolini和我在 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中原 论证的,我们必须要进入中 为什么年轻的学者一员为社会 学家,并且后来加入学家, 等。这个世代般系、为学家 该要被社会学系的检理 该要对场域、 世界的和意识 性的策略的着重,因为那象 征了过去对于多数意大利学 科的解释。

在1951 (当最重要之 一的期刊 Quaderni di Sociologia de Franco Ferrarotti 和其指导老师哲学 家 Nicola Abbagnano 一起 设立)和1961年间(当时 三的社会学派经历国竞争之 后而设立)见证了社会学基 础建设的打造,以及意大利 社会学的设立。回首过去, Diana Pinto 把这个时代分 为两个, 若 1950-1956 是社 会学的发现期, 那后来则是 "文化中心",可是我认为 "多重中心"可能是更好的 比喻方式,

虽然大学是意大利知识 界的核心, 当Balbo与其 同事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生 病了的科学"、承认认为社 会学家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国 家,因此让社会学只是学院 里的替代学科。在那之前, 社会学的基础是在学院之外 的,像是研究中心如Centro Nazionale di Prevenzione e Difesa Sociale (Milan), 文化组织像是 I1 Mulino in Bologna, 以及 政治运动像是Comunità(由 Adriano Olivetti 建立,其 特殊的创业观点把社会学看 成是在工厂内外培力社群的 工具)。这些都建立了长期 的联络,有着文化基础和国 际的组织(像是Ford Foundation 以及 UNESCO), 虽然 有名的出版社像是 Einaudi,

Comunità (Olivetti 建立) 和 Il Mulino 也都辩论社会学如何和其他学科不一样 (特别是哲学)。同时,学者的网络也追求应用导向的社会学(在 Milan, Genoa, Turin, Florence, 和 Portici),像是工业关系,经济社会学,小区研究,选举研究等。

在1950年代尾声,意 大利社会学是个双面的学 科,在理论(功能论导向) 和应用之间拉扯。"理论" 通常意味着教条和偏狭的 对于Parsons, Merton, 和 Lazarsfeld的诠释; 田野 通常包括了标准的调查和基 本的民族志,没有创新的空 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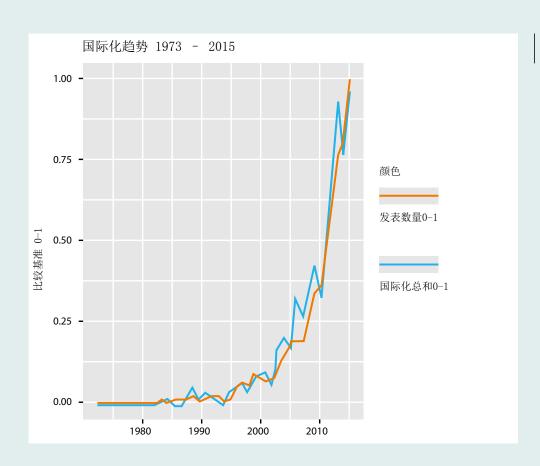
尽管其狭窄的聚焦, 社会学变成了"常态科 学",这是很必要的。第一 代的社会学家(包括Ferrarotti, Alessandro Pizzorno, Sabino Acquaviva, Eugenio Pennati, Achille Ardigò, Luciano Cavalli, Giorgio Braga, Filippo Barbano, 其地位是"libero docente",这让他们可以 在大学里教书)用其专业和 名声建立了社会学的阵营。 尔后其训练了一批新的、更 专攻的新生代学者, 进入了 意大利的大学系统, 而社会 科学也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在1960年代,社会学的地景改变地相当大。 社会学要当意大利王子的导师的美梦已经枚了,取而代 之是在学院内外有更稳定的地位,后来的社会学也在学院里制度化了。第一个授予学位的大学成立于1962年的Trento。社会系后来成立,伴随着政治系。

来信寄给 Andrea Cossu <andrea.cossu@unitn.it>

> 国际化意大利的社会学 1970s-2010s

Flaminio Squazzoni 和Aliakbar Akbaritabar, University of Brescia, 意大利



国际化意大利的社会学, 1970s-2010s

大利社会学家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教育和研究机构里面。制度画得聘用和升迁系研究机构里面。制度画得聘用和升迁系或透过游上而下的管制、以及典范学校或是地区学校的冲突和共存,这让社会学得以扩张到不同的系所里面。例如,意大利的大学中,社会学的教职视差不多和经济学数目一样的(大学1000名正、副、助教授)。然而,当这个可能显示了我们社群的成功演化,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会带来更好得研究,或是更差。

为了要去发展出一些量化的对于意大利社会学出版的分析,我们用了MIUR (意大利大学与研究部)所有1227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的名字(包括2016年开始的博士后),然后搜寻Scopus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国际期刊,会议手册,书籍,章节等,还有意大利的顶及其刊,时间涵盖了1970年代到2010年代。

我们发现了 63.8% 的意大利社会学家有至少一篇被 Scopus 收录的期刊发表。这意谓着三个社会学家之中就有一位没有在上述国际期刊、书籍章节、会议手册、或是国内期刊发表过。

有一些意大利的社会学者的名字很常出现在数据库之中。例如,五个人发表了超过35篇文章。另一方面,有大约20%(249人)出版了一篇文章。若考虑到出版的影响,我们发现52.4%(3515人中的1840人)并没有被引用过。

有趣的是,该资料指出了地理上的差异。 北部(45.5%)和中部(27.2%)的社会学家比南 部的社会学家发表的要多得多,这说明了自我 选择的偏见或是负面脉络的影响,或许反映了 不平均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然而,只有透 过进一步的大学聘用过程分析,其透过MIUR 数据库对于聘用委员会和候选人的重新调整, 这样才可以显示出这样的偏见是因为自我选择 和物以类聚的关系而非脉络影响。

意大利的学术界或许不会惊讶于这样发现,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有趣的结果。贯时性分析中我们考虑国际的出版合作关系,发现社会学家在国际上很活跃,也暴露在国际研究的标准之中。而在计算非意大利的合作者占总合作数量的比例之后,我们发现国际合作的比例显著地在这几年增加,出版量也是。这些趋势很类似,而国际合作的数量成长率过去十年超过了50%(见图)。

虽然进一步的分析需要去系统性的看导致的因素的影响,这个趋势很可能是 ANVUR(意大利评量大学和研究的政府机构)的正面结果,该机构成立于 2010 年,目的去评量 2004年以来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家花了些时间去调整发表策略,许多人原本对于国际期刊并不熟稔的也开始了解到了发表到知名期刊的重要性。此外,那些在国际上发表的社会学家或许已经决定去发表更多国际文章好把过去的投资获得回馈。

我们并不想说这样的制度压力带来了简单

的达尔文影响,也就是说科学家只是为了求生 存而做出调整。然而,对于资金的竞争的增加 不论是在国际或是国家的层次

以及出版的家都可以增加国际化程度和在学术声望。简言之,我们可以说"Eppur si muove"--"这是有在动的!"■

来信寄给 Flaminio Squazzoni <flaminio.squazzoni@unibs.it>

> 意大利社会学的性别偏见

Annalisa Murgia,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英国, Barbara Poggio, University of Trento, 意大利



Trento学生运动,1968年。

意大利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关系相当复杂,由一系列的现象和事件所构成,并且象征着意大利学术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

性别研究在1970年代进入了意大利的社会学辩论之中,这是由于几位先驱的女性社会学家所导致。就像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理论对于性别的反思首先在在学术界之外开始,并且特别是政治上的女性平权运动,围绕着这个议题而展开的像是堕胎和离婚。但是这个紧密



1968年女性主义运动的集会。

的和政治的连结也阻碍了性别研究在学术体系中的制度化,因为学科往往需要独立于政治之外,所以性别研究一直需要和那些质疑其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控诉搏斗。

但是意大利社会长期以来被标志和看成为有着传统性别秩序的社会,这清楚地反映在大学体系之中。广泛的性别差异仍然可以在科学学科中看见,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剪刀效应":女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多于男性,而且有更多的女性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但是女性的教授比例却非常少。在政治和社会科学中,2015年正教授女性只占了26%,39%的副教授,46%的助教授(大学教育和研究部,2016)。很少的女性是期刊,特别是好期刊的编辑。

此外,意大利学术体制的严格结构提供了有限数量的官方课程,这也让性别研究被边缘化了,所以要引进新的学科是很困难的,特别若是没有完全的正当性,如同性别研究,或是若是推动者只是年轻或是边缘的教授,那则会更加困难。

同时,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也阻碍了性别研究进入学术场域。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重要角色的差异理论,其偏好自我意识和分离主义的宣称,并且不信任大学,认为那是父权的堡垒。此外,如同 Saraceno 说的,意大利的女性主义学者之中那些想要在学院中发挥影响力的,长期以来在辩论的都是制度的策略,也就是应该引进特定的性别研究呢,还是应该要推动主流的性别研究观点?而意大利大学体系的僵固性最终引进了女性研究,然后才是性别研究,后来有了规律的教学课程,提供学生课程与活动,也开设性别研究中心。

直到1980年代性别研究才开始争取被完全 地承认的地位,这个延续到了21世纪。社会 学里面重要的一步是2012年跨出去的,在意 大利社会学会内开启了一个特别的分支。

过去几十年来, 意大利的性别研究已经逐 渐扩张, 但是这个扩张有点是分裂和非系统化 的。今天,性别研究在意大利的学术社群之中 仍然被局限在特定的环境中。教学和研究的声 誉累积通常被连结到个别的女性学者,并且 以她们在各自的大学中获得的承认度为基础。 此外,给大学生和研究的的机会还是非常有 限。一项调查显示所有的学士和硕士的课程在 2011-12 年中只有 57 个课程着重在性别,非常 少的比例。只有 1/4 的性别课程是在社会学底 下开设的,而且没有性别研究的学位被授予。 研究所的性别研究课程也很有限,12个专门 课程,6个硕士课程,4个博士课程。最近几 年甚至还倒退,是由于撙节政策和预算缩减, 因为性别观点仍然在追求学院内的承认地位。 这个处境也被持续对于其政治偏见的控诉和广 泛的天主教会运动寻求拒绝性别研究的科学基 础所恶化。所有这些也都限缩的性别研究的扩 张,让其更加边缘化。

尽管大量的产出和对许多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贡献,性别研究今天在意大利还像是 Di Cori 所说的被看成是"认同的不确定"的状态。甚至在社会学里面,性别研究缺少了系统化和全面的正当性,而这个状态将会在意大利持续下去。

来信寄给 Annalisa Murgia <a.murgia@leeds.ac.uk>
和 Barbara Poggio <barbara.poggio@unitn.it>

>被宰制的学科

意大利学术界中的社会学

Massimiliano Vaira, University of Pavia, 意大利

期以来就争论的所谓对于社会学的承认是一种科学学科的看法在意大利是一个新的事件。社会学作为晚期出现的学科,其承认度和制度化都不能说是完成的。结果就是现在的社会学处于一种被宰制的位置。从布迪厄的角度去分析,本文描述了2000年的社会学学科处境,使用官方数据报括了学术人员、课程、系所等说明社会学的边缘化,被宰制的处境,并且其受限的权力是如何在意大利被呈现出来。

社会学可以被看成一种混合的学科,是一种处在纯粹与应用研究之间的人文科学。对于理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反省让社会学更接近哲学,或是纯粹理论,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则生产了应用的知识,可应用到不同领域。虽然其他的学科像是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等都有这种混合的特质,但是这些学科对于理论和应用的划分都很显著,有别于社会学的区隔。

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学处于一种濒临死 亡的休克状态。这种不完全的制度化和混合特 质让社会学有着不确定的认同,仍然处于边陲 地位,和公共辩论不相关。

这个社会学的濒死处境不论是在学术或是 社会中都削弱的学科的权力。这透过全国性的 数据就可以显示社会学有多么边缘化。

首先,意大利所有大学(包括97所公立,私立,"虚拟"学校)900个系所中,只有5个社会学系,这里指的是那些以社会学为名的系所。而2012年里,2687名学生中只有18个社会学主修,由16所院校提供。2087位研究生中只有22个社会学,由18所院校提供。2016年则是913名博士中只有不到10个社会学博士。

这些数据相当清楚地显示了该学科的边缘

位置。但是关于学术人员的资料一旦和其他学科相比之后,更加明显。该表格总结了 2000 年之后的比较。6个比较的学科占了学术人员总数的 60%,这是 2015 年的数据。数据显示社会学有多么边缘化,而和更应用的学科相比,还有"纯"学科和甚至是心理学这些比较相近的混合学科相比,边缘化程度更加明显。

作为一个学科场域,社会学因为一种双重 巴尔干化的分裂而很积弱不振。第一,其分散 在不同的系所,像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律、 医学、工程、建筑、人文等,其扮演了一种辅助的次要角色,被其他学科宰制。虽然这有时对于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像是数学是经济学、工程建筑、医学的部份,而心理学或法律是政治、社会、经济科学的部份,但是这些学科比社会学还要有核心取向。例如,对比于意大利的5个社会学系,其他有10个艺术系,18个心理系,12个法律系,35个数学系,56个经济系,137个工程建筑系(这位于一个特殊的Polytechnics制度领域中)。

同时,社会学也是内部分裂的,分成很多componenti(派别)。有三大派别,但是不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立场上。这让意大利社会学很难去形成一个整合的学科,很难有整合的方法去研究社会。

最后,社会学的学术社群从来没有办法开创一个信用累积的体系给专业社会学家。和医学、法律、工程、建筑、心理学、经济学相反。这有双重的影响。第一,这让社会学处于专业市场上的不利位置,社会学的毕业生不被认为有专业技巧,也不被认为有专业知识,大家都会说社会学家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不知道。第二,社会学在学术中是弱者,社会学不宣称去训练"专业人员"让这边缘化更加巩固。

终身职教授的数目(以学科和年度划分)

	工程和建筑	艺术	经济学和统 计学	法律	数学	心理学	社会学
2001	6241	1769	3794	3957	2494	872	685
2005	8738	1867	4406	4612	2575	1086	817
2010	8608	1670	4647	4765	2443	1239	933
2015	7802	1382	4309	4328	2171	1238	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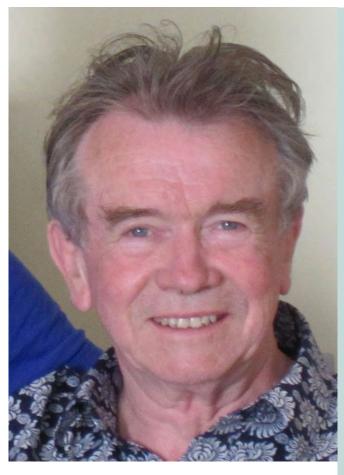
处于学术边缘的意大利社会学

这些结构和动态提供了至少一种印象式对于社会学受宰制的理解。明显地没什么科学、学术、社会经济的资本,社会学在意大利被从三个学术端所移除,处于剩余的位置,那就是科学承认端,学术权力端,经济和社会承前已经说明了这个学科的机会有限,很难获得象的也说明了这个学科的机会有限,很难获得象的是物质的资源。这样的处境,是一个学科的根度历史的产物,以及学术和社会不确定地位,还有"双重巴尔干化",没有专业名声,这些都让意大利社会学处于学术阶层地位的底端,并被边缘化。

来信寄给 Massimiliano Vaira massimiliano.vaira@unipv.it>

> 全球时代的结束?

访谈Martin Albrow



Martin Albrow.

Martin Albrow是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 早期以韦伯学者的身份广为人知,并且 (1970)一书。Albrow作 着有Bureaucracy 为全球化的理论家写作了一本先驱的作 品: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1996)。其他著作还包括 T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1990)和Do Organizations Have Feelings? (1997)。早期他拜师于 Norbert Elias门下, 然后从University of Cambridge得到博士 (1973)。他在世界各地教过书,也是英国 社会学会长(1985-7)以及ISA的期刊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创刊主编(1984-90)。他 是University of Wales的荣誉退休教授,也 是英国社会科学院士。

本篇访谈是Albrow教授在罗马尼亚的 University of Bucharest给社会学和社工系 的演讲,由该校的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组 织(http://icub.unibuc.ro/),访谈者是Raisa-Gabriela Zamfirescu和Diana-Alexandra Dumitrescu,都是该校社会系的博士生。

RGZ: 你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 这是怎么开始的?

MA: 事实上我接触全球化理论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我的社会学生涯是在我得到历史学位之后的事情,因为我后来去了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读了社会学,然后1961年开始教书,当时我正在写关于韦伯的博士论文。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写论文,因为我要教书,而我的兴趣又很广。我最后决定把重点放在组织,而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科层制,于1967年出版。

RGZ: 而且被再版了8次。

MA: 是的,那本书很成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学生发现很有用,我也因此变得出名,还持续了好几年。我发现我有个典型的学术生涯,成为教授,然后成为英国社会学会会长。这是在 1980 年代。我在编辑学会的期刊 Sociology 之后便得更出名,后来被邀请去编辑 ISA 的 International Sociology。那是很大的转变。那在 1980 年代中期发生,正值"全球化"

变得重要的时候。当我急着完成我对韦伯的研究的时候,我问我自己"韦伯若活着,会做什么呢?"我想他会研究这个世界史的新方向,他会对地缘政治感兴趣,也会继续其研究。他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会对全球化感兴趣。

所以,我在同年完成了我研究韦伯的书: 1990年,那年我和我的助理 Elizabeth King 一起把一系列的文章收录到一本书中: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Reading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y。其在 Madrid 的 ISA 世界大会出版,与会者可以得到一本,那时有 4000 多位社会学来自世界各地,这在我们的学科中开启了全球化这个字。

RGZ: 谈到最近关于地域主义和全球化,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你怎么看欧盟的未来? MA: 我想欧盟的一个问题是其还没有在世界其它地方发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印象,其对于全球议题也还没有足够的说服论述能力。我想这是最弱的一点,但是当然啦在全球的层次上要有一个整合一致的架构是很难的,极度困难的。

脱欧我想你可以说对欧盟有两个结果。 第一是其可以让欧盟更强壮,更整合,了解 到其有弱点,也必须协调得更好才行。英国 一定也是希望欧盟强壮,没人希望欧盟变 弱。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双赢的,若是英国 和欧盟同意,欧盟就会更强。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是有可能其他国家也会脱欧。的确有许 多国家反欧盟,反全球化,反建制派运动。

RGZ: 那么申根政策呢? 申根政策取消了欧盟之间人流动的边界控制, 但是在难民危机之后, 这个政策被大加抨击。

MA: 当说到申根,我想我学到的是领导人常常是积弱不振的。"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不能妥协的"这种说法听太多了。原则从来就不可能完全被实践,总是有妥协。所以,例如人的自由移动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作法的,依赖于社会安全法律和居住法律。许多城镇甚至有自己的居住法。自由移动这政策是可以在英国和欧盟之间谈判的,而不是全有或是全无。另外一个错误是难民危机,Merkel不应该说"让所有人都来"。这在政治上很难被理解,而且会让其他国家拒绝难民。

DAD: 很多人谈论社会媒体和社会运动, 你

怎么看待数字化沟通的影响?

MA: 年轻人是和数字化一起成长的,或许感觉到所有的运动是数字化所启动的或是导因于数字化的。但是我必须提醒的是,在1968年有年轻人的运动,这远早于数字化。此外,1960年代也是一个反对文化盛行的年代,伴随着大学里的运动兴起。有趣的是这在不同的国家中都自愿性地发生,他们不必然有跨国的协调,因为他们反对都是类似的事情。

数字化的确有影响,其可以让自愿的领导型态产生,也不必然可以预期。以反全球化运动为例,在1999年的Seattle 反WTO运动,上千人到的Seattle,特别是加拿大来的。美国总统柯林顿本来要演讲,但是因为抗议而取消了。传统媒体给予了全球性的报导,那时没有脸书,所以我想数字化的影响是夸大了。数字化的确让沟通更有张力,也加快了响应的速度。政治人物知道这点,所以用社群媒体当作沟通管道。我们也发现传统媒体像是报纸或是电视虽然正在式微,但是还是很重要,因为它们还是可以把人聚在一起,面对面,即使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

数字化在其它领域有更大的影响,像是安全、监视、传播等。政府得到的知识,秘密,黑客讯息等也更重要了,我知道任何的email都会被骇,只要想骇的话。

DAD: 从一开始社会学家就把社会比喻成生物的有机体,并且这个比喻一直延续下来,你怎么看?

MA: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演化。生物过程的变迁比社会变迁还要被理解得更多更好,这是因为我想象是继承、认同形成、社会单元的形成等都是文化性的。人类文化的一个很大能力是个体可以从其出生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危险也来自人类好奇心,会发展出会灭人类的东西。我不是只是说炸弹这类的东西而已,我也指涉生物有机体,病毒等。不像生物演化的缓慢过程,机器人可以让人类变得不必要,所以人类的知识造成了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RGZ: The Global Age 可能是你最著名的书了。你怎么从你的论证角度看现今的政治动态?

MA: The Global Age 是在 90 年代中期写的。 我那时对于为什么"全球"这个新语言变得 那么受欢迎感到很有兴趣。我后来的结论是

1945年的事件和1970年的事件呈现出了一 种对于全球议题的新的承认,那就是一种 对于地球的挑战。这和全球化是不同的, 最 狭隘的意义是美国推动其世界经济的利益,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全球议题。在战后的年 代,最重要的议题是核子战争,环境威胁, 贫穷的增加,海洋污染的。这些是不能在全 球层次上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就是为 什么全球的这个语言变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全球化在美国霸权的脉络下变得政治化, 特别是在1989年苏联瓦解之后。所以The Global Age 一书主要是响应那些认为全球 化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的人。全球时代是一 个人类集体受到威胁的时代,现在,20年 过去了,怎么了呢?我会说全球时代的政治 症再结晶化,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启蒙, 全球化的, 受教育的人可以从全球化得利, 并且知道挑战是什么。这组人是领导也是反 对派。然后在另外一边了则是剩下的人。然 后两边越来越疏离。

全球时代的政治已经变成跨国的了。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什么国家发生,都会被看成的全球的。我想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所以,讽刺的是,当任何人看到和读到荷兰的可能政权转移,或是厄瓜多发生的到荷兰的可能政权转移,或是厄瓜多发生的事情,这些变化只会在全球精英和再被理解。这些变化只会在全球精英和再被理解。这就是全球的框架。我们没有办法不用这个框架去了解国家的政治。这是我的论点,我相信这论点被过去 20 年发生的事情所强化了,这个观点下,我的确认为数字化的、关系更有兴趣。

DAD: 回顾看你的生涯, 有那三个主题你会希望你一开始就研究的?

MA: 我是在一个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有强烈看法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放弃的自然科学,但是我现在了解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有很多是类似的,比我们想象得还类似。所我希望我可以对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有很好的掌握,像是辨识不同的力,以及我们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所以第一我希望我对于科学有更多的理解。第二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对中国很感兴趣,而我去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时候我上了很好的

研究中国的学者的课,而且我写了关于中国的报告。后来我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甚至去了一趟中国呢。但是在我生涯中我从没能学习中文。我现在可是开始在学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我18岁的时候就学中文,因为中文可是个彻底完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外貌,对世界不同的理解,我要是早点学习了中文,那可是多么美好的一项人生的资产哪。

第三个是我相信我可以对宗教有更多的掌握,而且可以从中获益。我在国教的家庭中长大,后来成了不可知论者。当我年纪大了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宗教的世界观有着很重要的洞见。当然,你在罗马尼亚有着最好的宗教思想家 Mircea Eliade。我到了50岁前都没有读过他的书,我希望我在20岁的时候就念过他的书了。

来信寄给 Martin Albrow <albrowm@hotmail.com>
Diana Dumitrescu <diana.dumitrescu@icub.unibuc.ro>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raisa.zamfirescu@gmail.com>

> 科索沃的殖民 遗绪

访谈Ibrahim Berisha



Ibrahim Berisha.

Ibrahim Berisha 出生于科索沃。他在Prishtina完成哲学和社会学的大学学位,然后到克罗埃西亚的 Zagreb 读研究所,拿到传播社会学的博士。其后来成为科索沃和国际的记者和编辑,现在则在 University of Prishtin 社会系教书。他出版了传播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书籍,也出版散文和诗集。其最新的书是 The Death of a Colony。访谈者是 Labinot Kunushevci,是 University of Prishtina 的社会学硕士。

LK: 在你的 The Death of a Colony 一书中, 你描述了科索沃的历史是一个殖民地的历史, 这是什么意思?

IB: 第一,我想很重要的是每个殖民者都是不一样的,被殖民者也不是铁板一块。但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呢? 例如,殖民者会用不同的叙事去正当化其殖民,也有不同的殖民目的。例如,法国对于阿尔吉利亚的殖民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以及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是不一样的。

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殖民是从神话开始的,后来扩张到政治、经济等领域。欧洲的殖民者并不以神话建构为基础进行殖民,也不建构特定历史事件的诠释。而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则是以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为神话殖民的基础,认为那是"正确的历史"。

LK: 你可以多说一些关于塞尔维亚对于科索沃的殖民目的吗? 相较于其他殖民史?

IB: 殖民的目的和过程都不一样。英帝国没有试图要铲除印度的本土人口,但是塞尔维亚政府有,其试图要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种族清洗,而整个殖民侵略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阿尔巴尼亚人必须达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消失,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达成。这样企图发生了好几次了,最惨烈的一次是在1998-1999的科索沃战争中,这包括了宗教、文化、学术、艺术领域的参与多数住着阿尔吉利亚人,法国人终究会离开,企包括了宗教、文化、学术、艺术领域的参与多数住着阿尔吉利亚人,法国人终究会离开,是科索沃被塞尔维亚政府看成是暂时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地,是阿尔巴尼亚人要离开,让给塞尔维亚人。

LK: 你认为殖民策略的制定是以国家建构计划 为依据, 或是被殖民者所主导?

IB: 殖民的策略通常是有实质的影响的。在科索沃,这个影响就是社会人口的变化。在塞尔维亚人于20世纪后开始移入科索沃之后,都市、乡村、建筑等都产生了改变。对于中古世纪历史的复苏和重构形塑了这些的变化,然后建造了新的村庄,城镇,学校,道路,经济基础。人口的组成也可以轻易的被改变,因为整个塞尔维亚的政府都已经布署在那边了,包括了军队,宪兵,法官,甚至政治人物。阿尔巴尼亚人的财产被合法充公,并且以农业改革的名义交到了殖民者的手上。

在最晚一次于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农业改革,村庄的家庭只能持有10亩的土地和森林,这对家庭的经济来说影响很大。1950年代,超过60人的农业家庭只能持有10亩的土地。这就是经济迁徙的开端。年轻人宁愿到Belgrade或其他南斯拉夫的城市去找工作。而炼金师,面包师,馃子师,手工艺师等以离开了。他们离开科索沃是因为那里没有市场。但是他们没有切断和家乡的联系,还是会汇款回去。

相反的是,当殖民者进行占领的时候,他们是拥有从母国政府来的大量财务资源的。那这样的社会人口的变迁到底是怎样呢?1912年塞尔维亚人占了科索沃人口的1/5,到了1939年这个数字成长到40%。殖民也不仅改变了人口的交流,对定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村庄、非都市地区的种族隔离让阿尔巴尼雅人无法分享到社会经济变迁的果实。好几年来阿尔巴尼雅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例如关于阿伯尼亚的大学课程要到1970年才开设),他们离还失去了财产之后变得相当贫穷,并且被隔离。在所有从南斯拉夫来的民族之中,阿尔巴尼亚人是唯一不讲斯拉夫语的,这也是另外一种隔离。

LK: 很常会听到人说,在共产党时期 Tito 的统治下,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和经济比较好,这是真的吗?

IB: 在 Belgrade 政府不同意阿尔巴尼亚人成为平等的一员,不给阿尔巴尼亚人那些塞尔维亚人所享有的权利。在 Tito 的统治时期,特别是 1966 年之后,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真正改革的表面变化。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第三大的族群,仅次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但是南斯拉夫政府有意识地去做出该扁。50 年代有大约 200,000 阿人从科索沃迁徙出去,逃避政府迫害,并且造成了大量的民族认同变化:南斯拉夫的"土耳其人"增加了 260%,从 1953年的 97,945 人增加到 1961 年的 259,536 人,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的认同改变。

在 Tito 统治时期,殖民更进一步。科索沃拥有大量的铅、锌、银、铜、镁等金属矿产,但是这些产出都被送到塞尔维亚的 Vojvodina 或其他地方加工,所以科索沃其实是发展落后的。

LK: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学怎么看待塞尔维亚的对于科索沃进行的政治、族群、文化宰制? IB: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仍然很年轻,而且长期被教条主义所控制。Prishtina 大学的社会和哲学系于 1971 年建立,最知名的社会学家 Fehmi Agani 教授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udies,他在 1999 年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被处决了。Ukshin Hoti 是另外一位从 Prishtina 来的社会学家,90 年代的时候被逮捕,罪名是鼓励言论自由。他在 1999 年被列为失踪人口。Hoti 教授是在美国求学的,研究政治社会学。

今天,一群年轻的社会学家拓展了社会学的议题,包括了文化、社会结构、宗教、性别平等、传播、政治等。他们带进了新的方法,问新的问题。这是进步的象征,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透过意识形态的框架去从事社会学研究,因为意识形态是特定的政治宣传,阻碍了社会学批判的思考。

LK: 那殖民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IB: 今天我们可以谈后殖民和后社会主义,因为经过了最惨淡的阶段之后,科索沃社会正在重建,要把自己整合到国际的财金、政治、文化体系之中。然而,这样的整合虽然看似充满希望,但是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失望、迁徙自由的限制、年轻人失业等让人想起了过去的殖民歧视遗产和发展落后的历史。

现在政策无法提供社会平等的失败让年轻人变得犬儒。多数年轻人想要离开科索沃,想要投入全球的就业市场,寻求机会,但是让年轻人在全球市场上找到工作去需要对教育体系做出

改变的。

LK: 神话、荣耀、教条、政治宣传等如何影响 了科索沃社会? 而这如何导致了阿尔巴尼亚人 的从属性? 而阿尔巴尼亚人有办法去抗拒这样 的宰制吗?

IB: 巴尔干半岛是个充满虚幻的花园。谁是这些"荣耀记忆"的传承者呢?知识分子,艺术家,半调子的政治人物。他们使用虚假的词藻去安抚大众,像是家园,民族,英雄,神话事迹等。他们的语言充满了爱家爱国这类的字眼,伴随骄傲和威胁的语气。他们是政客追求权力的工具。许多人一直召唤这些神话,为的是去骗那些失业和落魄人口,鼓动他们的情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教条洗脑充满各个角落。过去5年许多年轻人加入了ISIS,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因为那填补了政治上的某个空缺,吸引了那些失望的年轻人。

LK: 南斯拉夫的脉络在今天科索沃的政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IB: 南斯拉夫现在已经是历史了。那是在文化政治运动中因为地理相近性、语言、民族相似性而开创出来的东西,它不能存续的原因是因为其建立的基础不是平等主义。阿尔巴尼亚人受害最深,所以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政治中并没有容身之处。■

来信寄给 Ibrahim Berisha <<u>iberisha5@hotmail.com</u>>和 Labinot Kunushevci <<u>labinotkunushevci@gmail.com</u>>

> Ōtautahi后灾难 时代的新政治

Steve Matthewma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奥特亚罗亚社会学会会长



天主教堂广场, Ōtautahi (Christchurch) 2011 大地震后。

速的都市化面对着前 所谓有的贫富差距, 全球暖化,大量绝种, 因此,如何永续兼顾平等是有 世界史的重要性的。世界上多 数的人口住在都市,2050年将 会有 2/3 的人口会住在都市里 高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警告的: "全球不平等的增加。京游

"全球不平等的增加,灾难的增加,都市化和自然资源以及能源的跺消耗,这些都是威胁,让风险上升到不可预测、全球的等级。"

都市因为能源使用者不成 比例的多,所以永续能源的发 展的关键还是在都市。都市目 前使用了全球能源的 3/4,若是都市化继续下去,2030年之前世界各国会投资 90兆的资金到都市、土地使用、能源基础建设中。光是能源基础建设而言,国际能源署使用了16兆美金去做这件事情,并认为电力"将会占这项投资的制度,有能源和有权利使用能源基础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奥特亚罗亚纽西兰是世界上最都市画的国家,从1980年开始其就见证了全球经济不平等的最恶化的阶段。我们最近开启了一个3年期的研究,注重在能源基础建设以及一个后灾难都市Ōtautahi (Christchurch)的电力。

一般说来,要去完全地重

建一座城市是不可能的,但是 2010 和 2011 的 Canterbury 地 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建 立永续和平等的新城市,去建 构一个包容和韧性的电力能源 系统,使可以抵御未来事件的 冲击和破坏,像是自然灾害, 人口成长,气候变迁。

我们把Christchurch视为是一个世界级的实验室,意思是,以往的研究者着重在大都会,但是世界上多数的城市是 50万以下的人口,而且像是 Christchurch,城市必须面对处理气候变迁和海平上升。"Christchurch,城市以上城市一样,会受到自然的威胁,但是该地震所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所以此城市已经变成了国际级的实验场,让

我们知道怎么期待和希望未来 的城市面貌,因为这是一座临 海并与海平面几乎等高的小城 市。"

计划一开始是很有希望的,没有类似的城市接受到那么多的资源过。Christchurch市第一个纽西兰的城市之中发展出实时资源使用数据的,也是少数几个最早参加"未来城市先导计划"的成员,该计划是一个目的在改善城市生活的论坛。还有,其也被洛克斐勒基金会报导是 100 大具有韧性的城市之一。

然而虽然地震提供了从零 开始的机会,但是商业模式对 是相当普遍。电力仍然由水力 产生,并且被少数几个私人公 司所垄断,然后没有太阳发电 的设施,消费者的分散发电网 络也很少,而且虽然纽西兰有 很好的风力资源,但是却派不 上用场。

这样被浪费的机会是很可惜的。20世纪中叶奥特亚罗亚纽西兰的电力全部来自水力发电,加上另一种再生能源:地热能。然而,今天石化燃料占了国家电力的三分之一,如同 Benjamin Sovacool和Charmaine Watts所说的:"纽西兰电力部门在某种意义上是很特别的,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居然再生能源的比例越来越少。"

理论上,转型到100%的 再生能源供给不应该有困难。 再生能源的好处毫无疑问,其 减少负面的消耗像是空气污 染,而且更可预测和稳定,污 少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消耗 较少的水,更有效率,还提供 在地工作机会和收入。总之, 再生能源比永续,更经济,更 具有韧性。

实际上,转型到100%的再生能源体系不应该是困难的,而且照今天科技的标准是完全可行。奥特亚罗亚纽西兰有丰富自然资源,而且照政府

的说法,纽西兰是世界上享有最多人均再生能源的国家。它有风力、太阳能、湖和河。若地热也算进去的话,Sovacool和Watts认为2020前整个国家的能源都可来自再生资源。

但是能源问题总是和政治和经济纠结在一起,而新的科技或是自然资源浩劫可能比起社会、文化、制度的因素逐渐的因素不重要。政治精英和资本家比能源专家、原住民团体,社运者等还要常见,所以构成了再生能源政策的阻碍,被掌权相后,所以有关地集中发电厂所胜过。

重建城市是很困难的,在 奥特亚罗亚纽西兰的最近上一 次重建是在 1931 年的 Napier 之后。在 Christchurch 当然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重建 很缓慢,痛苦,问题重重。居 民持续地对于政府的重建计划 很沮丧。

但是还有希望。"毛利人对于灾难的管理方式对这次地震所做出的响应,以及整个恢复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典范,"Christine Kenney和 Suzanne Phibbs 写到: "在危机委理的阶段,毛利人的风险管理方式是合作、有效的,被 kaupapa (文化价值)所形塑,特别是『aroha nui kite tangata』(把爱传给所有的人)。Ōtautahi的人已经显

示了世界等级的创意,一种新的"暂时都市主义",小型的都市发起的重建,像是花园、集会广场、公园等,这些都改善的都市的生活。"

这些小区创意可以提供给 更永续的都市结构一些启 吗?当我们开始了一个为期三 年的研究计划去看都市由下列 上的重建,我希望我们学到 的东西可以提供某种创意的理 解,实际的指导,政策的可 良,提供给都市计划去转型到 强韧、透平、平等、包容、永 续的电力系统。■

来信寄给 Steve Matthewman <s.matthewman@auckland.ac.nz>

> 后灾难地理的创意運動

Holly Thorpe, University of Waikato,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Holly Thorpe在新的滑板公园前。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脉络之中,儿童和青年总是被认为是脆弱。然而虽然儿童和青年会暴露在高的肢体、社会、心里、政治风险中,但是把他们看成是"受害者"或许忽略了他们特殊的能动、创意、机智。

我试图要去超越上述的"缺陷模型",从事了一个三年的比较研究,提供在地声音一个空间,并且以青少年的在战争、冲突、灾难的生活经验为优先。我两个个案中包括了皇家社会马士登基金计划,聚焦在青年的非冲突运动的经验,并以政治不稳定和持续冲突的脉络为主。第一,Skateistan 是一个非政府的滑板学校,给阿富汗的弱势儿童。第二个是在 Gaza 的草根群体。在其他两个个暗中,我也研究了行动运动社会、心理、公民重要性,特别是那些住在被自然灾害所毁坏的小区,并且也研究复原的阶段:我们检视教会在 2010 和 2011 的地震后变化,以及在 2005 卡翠那台风后的 New Orleans。

我们对于地震后纽西兰的 Christchurch 的研究初步结果已经显示:人们使用多样且细致的方法去面对和处理各种权力交织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聚焦在运动参与和公民参与。2011的地震造成了185人的死亡,受伤的人则更多,

而且把市中心几乎铲平,毁坏了几乎 20 万的房屋。摧毁重要基础设施(道路、沟渠、水)的地震也会摧毁运动设施(健身馆,体育场,游泳池,俱乐部,体育馆等)。这些灾后的损毁其实一开始很少人担心,但是接下来运动习惯的损失在灾后几个月就出现了,居民无法顺利重建灾后的生活习惯。我考虑了灾后运动员和居民的经验,包括了组织、竞争、休闲的运动,也去研究忠于运动的人从事非竞争,不受管制或是"生活方式"的运动,又这些个体如何在灾后从事运动休闲。

在地震后许多参与者马上把运动视为是次要于健康和家庭与朋友的相处。可是运动后的几周,许多人承认了对灾难对于其运动的损害。像是 Emma 是一位冲浪者,就说: "一旦我把家务做完了,我马上意识到有一个生活中更大的东西遗失了。"对许多人来说,对于其整洲。对于滑板者来说,市中心的"红区"意味着其最喜爱的都市乐园的消失。攀岩者不仅失去了室内的攀岩设施,也失去了在 Port Hills 的攀岩场地,骑单车者也失去了好几条路径。对于排水道的损坏也迫使 Christchurch 的市民委员会去把为经过处理的水排到河川,

关闭地方沙滩数个月,中断了冲浪和沙滩使用者的惯习。

受访者描述了强烈的物质、情感、心里层次对于运动习惯中断的响应,而其他人则深深地感叹运动空间的消失: "我对于失去的那些地方感到相当悲伤,"一位日本攀岩者 Yukimi说,"我最爱的攀岩运动在那,我的计划在那,我好想它们。"

文化地理者 Tim Edensor 写说,个人通常借着"恢复家庭空间,习惯,时间"去试着要去最小化主要的损害影响,这对于许多生活风格运动的参与者来说的确如此,许多人寻求熟悉的运动身体的韵律还有生活风格,试图去处理压力,去重建个人和集体的认同,以及去强化新的归属感,许多攀岩者组织了集体攀岩场地旅行,某些路径成了 Allison Williams 所谓的"疗伤地景"。

对于某些 Christchurch 的居民来说,运动参与也帮主逃离了(若只是暂时的)日常生活的压力。例如 Aaron 是一位热衷冲浪的人,描述冲浪是如何对于与朋友社交的重要性:"这里有冲浪的社群,所以你会想要休息安静一下,找个地方静一静几天。"

一些 Christchurch 的年轻人也重新使用了地震空间,显示了创意的对于灾难的响应。 其拥抱了自己做的文化,反威权性格,滑板者 开创了室内的滑板公园,就在一处受损的建筑 里面。Trent 描述了如何挪用受损建筑作为"像 那些鄙视我们并且认为滑板没什么好处的人, 说再见"。他们不"坐在一起哀怨灾难带来的 伤害,我们是真正做了些什么事情,并且说 『嘿看看我们用这些损坏的东西做了些什么事情。』"透过创意的响应灾难空间,他们重新 定义了对于地的解读和诠释,不认为地震后一 定是死亡、损坏、和残骸。

地震之后,另类的运动也提供了机会去重新定义物质和情绪的灾难地理,重新建立了社会网络和连结。但是这样的行动运动的努力可以也是去包括剥削和商业化的面向的。2015年美国的 Levi Strauss 宣会去投资 18 万纽西兰币去建造一个滑板公园。多数的地方上的青年和父母们强烈地偏好 Levi 所支持的滑板公园。他们不批判跨国企业的投资,反而欢迎。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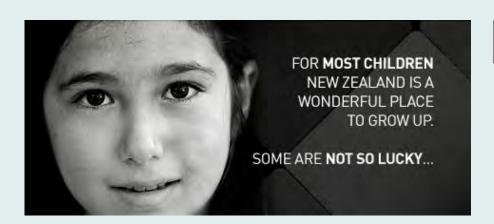
有些地方居民用网络市民委员会论坛表达了对于 Levis Strauss 投资后灾难 Christchurch 的经济考虑的担忧,以及市民委员会的默许的忧心。评语像是"我们需要用有想象力的方式去极大化我们的环境利益,而不仅仅考虑广告收益","Levi是一个跨国公司,寻求对公司最大的好处,不会关心我们的小区"等,这些都显示了居民是担心 Naomi Klein 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其中跨国资本企业看到了灾难后的市场商机,加上市政府缺少资金去补助运动和休闲娱乐设施。

我们进行中的研究或许是第一个对于非正式运动所提供的机会去改善战争或是灾难处境的全球研究,也是地一个去看不同权力型式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有想象力的青年如何响应了地方的处境,同时也被全球权力更跨国网络所影响。■

来信寄给 Holly Thorpe <thorpe@waikato.ac.nz>

> 无声无息的虐待

Elizabeth Stanley,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纽西兰组织 "Child Matters": 教导如何防止虐待儿童。

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之后,纽西兰的移民网站受到许多想要离开他们家园的人的注意。纽西兰肯定是有吸引力的: 拍电影的喜欢捕捉我们壮观的风景,而这个国家是一个充满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我们被认为是好客,进步,人权的国家: 纽西兰的女性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投票权的国(1893),在二战后,纽西兰人Kiwis对于发展国际的人权这点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纽西兰的修复式正义也是很有名的。

但是,若仔细点看,纽西兰其实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进步。贫穷增生,性侵害比例很高,而且在新自由主义的卖落下,毛利人有着不成比例的高坐牢率。所以移民所看到的表面光鲜亮丽其实是包装着排他、边缘化、罪行化的政治与政策。

没有什么比纽西兰政府对于儿童虐待的响应还要可以说明这点了。最近几年来,数以千计的纽西兰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证虐待的罪行。我的书《The Road to Hell》中,105个受害着描述了如何在国家的照顾机构和福利政策的居住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而那也只是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十多万待过这些地方的儿童的一部分。

这些证词是很冷酷的。社工通常把兄弟姊妹分开,有时候分开到几百英哩远,或是把儿童放到黑暗隔离的安全房间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有时甚至电极来处罚那些要逃跑得儿童。小孩若是抱怨性侵害的发生,就会被要求不能讲。居住设施也很有限,没有教育设施,然后那些恶霸小孩会被告知要去控制其他人。社工还会告诉小孩说没有人爱她们,体罚到小孩流血,或是用牙刷刷地板。他们把小孩当作犯

人,不尊重相对进步的政策法规,反而用恐惧 去让儿童更加受伤。

许多年后,受害者开始去揭露过去以及国家如何伤害或是失败地去保护他们。若把这些 画成表个,从忧郁正到后创商症候群,纠率、 吸毒、家庭暴力、坐牢等,而受难者也站出来,希望其生命经验可以被承认,理解,响应。

然而,纽西兰政府却反其道而行。当许多 其他国家像是澳洲、加拿大、国、爱尔兰等国 都会给的,像是公共肯认、个人支持等,这些 回应提供了一种管理真相诉说的制度,兴趣和 金钱以及后果我们都要看看。

多数的虐待已经开始寻求补偿了,这是透过社会发展部门的"历史诉讼单元"。不幸地,社发部也是那些反对这种答案的一员。一个受难者Peter说"若是我们没有完成那些事情,他们才不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的确,许多受害者遭遇到了一种不相信和 诋毁的文化,这些都发生在社发部,而很多年 来也无法去调查那些虐待案件,总是不合理的 预设所有的受难着都已经被政府部门所纪录。 受害着也被告知说因为其没有任何可以左证虐 待的档案,所以诉讼无效。

社发部也谴责受害者,认为问题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伤害不是从虐待而来,而是从生命经验而来。Sue就是一个例子,她被通知其宣称并不具有效力,社发部认为其问题是来自酗酒,而那是Sue早期生命就开始的经验。政府也拒绝承认任何其酗酒和她所经历的暴力、性侵害、辍学等之间的连结。

最近几年,社发部使用了一种"快速通过"的方式让700多件的案件和解了。受难着

通常对于一封短短的道歉性非常感激,因为那是

然而,为了接收总和,受害着要放弃其兴 起诉讼的权利,而且那些达成和解可以领取赔 偿的人还会被社发部威胁要取消其社会福利。

然而也有另外两个补偿的替代途径。第一,受害者可以打官司,虽然国家仍然依赖法律技术去降低诉讼。在消灭时效下,受害者被告知其诉讼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此外,政府也可能在知道自己不会胜诉之后取消受害者的法律协助。

第二,在2008年到2015年,受害者可以向保密倾听协助支持服务机构述说其经验,并且收到有限度的帮助,有十个咨询机构可以帮助找纪录和亲属等等之类。然而,就像该服务的名称一样,都是保密的。如Sue说的: "我们没有西敏寺系统(Westminster),我们有的是摆脱西敏寺的系统(Axminster)"¹,该系统让对于暴力虐待的噤声更加合理化。

若把国家这些罪行的历史藏起来,那么这对受害着来说一点也没有帮助,并且伤害仍然持续之中。纽西兰国家对于儿童的虐待是可耻的,这从学校的安全房间,长期的监狱封锁,不合理的对待在儿童青年家庭的居民,或是许多的中途之家,都是如此。若对于过往噤声,那只是对继续合理化对于那些伤害的社会、文化、制度的默许而已。

其他国家提供了例子说明了有更适当的取径:公开地诉说困难的故事,承认国家的角色,找出在虐待和长期伤害之间的连结,提供支持,独立的补偿方式,以及公开道歉。作为道德修补的一个必要形式,有罪的国家若愿意去负起责任,去承认犯下的罪行与暴力,这么做是可以帮助无数的身心受创、饱受煎熬、害怕无助的受难者走出伤痛。官方的承认、透过"承认、修补、防治委员会",将可以让受害着接受过去,并且这应该是国家首要任

务。■

注1: "Axminster"是对"Ax"一字的混搭和挪用,而该字的意思是"摆脱"(get rid of)。

来信寄给Elizabeth Stanley <<u>elizabeth.stanley@vuw.ac.nz</u>>

> 社运与学术

Dylan Taylo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Malcolm X的一段化激励了左派智库 奥特亚罗瓦经济和社会研究。

特亚罗瓦纽西兰的代议政治处在休眠状态,其第五民族政府持续执行新自由主义计划,而这计划是 1984 年第四劳动政府所开启的,其推动减税,私有化,偏向雇主的劳动法案。结果可预期的是:不平等的深化,无壳蜗牛的增加,危险劳动的上升。

工党和绿党透过 2017 年选举的备忘录而连结在一起,公开承诺若今天赢得选举会负起"预算责任"。就像许多其他的发展民主一样,奥特亚罗瓦纽西兰已经看到的投票率下降的趋势,升高的政治冷漠倾向,这趋势看起来工党和绿党也很难翻转。

然而代议政治之外也有创意的计划试图挑战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 在重新活化希望和批判的文化,以及开创反霸 权制度这两点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有着光明前景的发展包括了激进左翼智库的建立: 奥特亚罗瓦经济与政治研究 (ESRA)。《Counterfutures: Left thought & practice Aotearoa》 (反向未来: 奥特亚罗瓦左翼思想和实践); 举办年度会议: 社会运动、抵抗、社会变迁 (SMRSC) 会议,这三个都坚定地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现状。

ESRA 在 2016 年开始,从 Sue Bradford 的博士论文展开,其研究了左翼智库在奥特亚罗

瓦纽西兰的可行性。Bradford 长期投入社运,为贫穷团体发声,并是前绿党立法委员,吸引了学术和运动者去种下了一颗种子: "反抗的文化,团结和希望,透过转译剥削、压迫、边缘化的希望和议题"(https://esra.nz/about/)。早期的计划包括了研究住宅危机,重新思考经济计划,讨论新的政治组织模式。

ESRA 的目标(kaupapa,毛利与的"纲领"或是"目标")是很坚定地要去肯认毛利民族主权的。(这其实是这个国家的建国文件所保证的:怀唐伊条约,但是还没有任何的政府公开表彰过)。该提议试图去研究可以去超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策略方法,并且指导原则是知识的洞见和有效性是由上而下的,这对社会科学来说越来越重要,而这样的知识对于思考另类替代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很根本的。

类似的提议也带动了新的出版: Counterfutures。该期刊目标是"去骑和启动关于如何去理解、想象、影响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辩论。"其试图去开启一个在学术研究者和小区团体、工会、社运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对话。除了作为同侪审查的期刊,Counterfutures 也发表"介入"当代政治社会议题的文章,以及访谈社运者和学者的文章。该期刊在独立书店和大学图书馆都可以找到,并且

在免费把6个月内出版的文章上网,这是为了确保不被付费机制所限制。而多元的读者群也证明了读者是喜欢由社会研究和新的政治组织机会研究这样的另类思考文章的。

《Counterfutures》的前三期包括了从不同背景而来的作者,像是 LGBTQI+ 团体,社会学,毛利社运者,心理学,监狱废除倡议者,哲学,反贫穷运动,历史,工会,犯罪学,环境团体,传播研究。这些不但跨过了社运和学术的二分,也是跨学科的。

在年度的 SMRSC 会议也是明显有同样的氛围。该会议由 2014 年的土耳其学者 Ozan Nadir Alakavuklar 所举办,规模一直成长中。第三届吸引了超过 400 人参加,被认为是奥特亚罗瓦纽西兰的极左会议派的指标性事件,这也是从 1970 年代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一起聚集在一起。会议包括了毛利人主权,另类经济模式,太平洋岛族群社运,工作的未来,气候正义,健康与残障正义,当代工会等。重要的是,参与者包括了运动和学术背景的都 (http://counterfutures.nz/2/editorial.pdf)。

SMRSC 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已经面对遭遇过了从多元性而来的的紧张,这是有建设性的,而非轻视或是绕过它。2015 年的时候,SMRSC会议公开了运动和学术取径之知识生产模式之间的紧张,这也因此有了2016 年大会的主题: "运动和学术的分野"。所以该年的大会聚焦在左翼毛利人和白人(Pākehā,欧洲裔奥特亚罗瓦纽西兰人)之间的紧张;2017 年的主题则是 Ka whawhai tonu mātou,超越资本主义一超越殖民(https://esra.nz/socialmovements2017/)。

这就是审慎乐观主义的导致因素,而尽管 恶化的不平等和代议政治的脱勾,仍是如此。 首先,行动者的多元代表了一个重新聚焦和超 出代议的左派。像是许多已发展国家,奥特亚 罗瓦纽西兰见证了左派的分裂,其分裂是在注 重分配的阵营和注重认同的阵营之间开始的。 虽然这个分裂持续者,新的计划说明了分配和 认同并不是不同的领域,而有效的社运要同时 考虑这两者。

第二,这些计划展示了对于一个观念的强烈信念,就是社运生产的知识也包括了要去确定其知识是对合作和研究者有用的。原住民学者 Linda Tuhiwai Smith 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下是很重要的,伴随公共社会学和成长的社运知

识。结合从具体的社会斗争经验而来的知识以及学术知识,一个新的知识生产场域形成了。

最后,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其生产的知识的广泛程度,这都构成了反霸权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勇敢地去问我们如何可能用不同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个问题包括了重新活化平等得概念,寻求新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形式,解殖民,以及开启更永续的环境。这个计划才刚起步,而且很脆弱,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显示了若是不去考虑替代方案,那资本企业就永远长相左右。这样的计划在奥特亚罗瓦纽西兰因为社运和学术的合作而是有光明的前景的。

来信寄给 Dylan Taylor </br><Dylan.Taylor@vuw.ac.nz>

> 迈向原住民 犯罪学

Robert Webb,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奥特亚罗瓦纽西兰



毛利民族对于过去的骄傲象征是祖先看着 其后代子民的困难处境。Arbu使用Freepik 的图绘制。

全性化的,这在犯罪和受害的机率上是不成化的,这在犯罪和受害的机率上是不成比例的高的。这和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原住民族所经历到的是相同的。毛利民族只占总相一的15%,但是却比起其他族群更可能被复捕、定罪、服刑。尽管纽西兰有著名的修复式证义制度,并且就是以毛利民族的传统为基础的,毛利人的定罪率害是相对很高的,这对毛利人相当不公平,因为毛利男性占了全国男性罪犯的5%,女性则是60%。尽管大家广泛逐承认了这个体系的失败,并无法降低犯罪率,还造成受刑人的小孩和家庭必须经历社会排斥,但是最近有研究指出,受刑人数目还是会继续增加。

针对毛利民族的刑事介入已经从过去殖民时期到现在被从不同的方面被理性化了。在这

个国家历史的不同期间,立法者和政府官员都 是图去解释毛利人的犯罪行为,想要说那是毛 利社群的传统和结构下不证自明的社会问题。

数十年来,毛利民族也挑战了纽西兰国家政策的制度性种族主义。Moana Jackson (1988) 的 书 The Māori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 He Whaippānga Hou 从毛利的观点研究了刑事体制。这个分析描述了影响了毛利人生活的社会和历史过程,包括了殖民和强加的司法体系。这份报告批判了检视了纽西兰的刑事制度,指出了这样的实践和方法背后的文化价值。

当然,国家也曾试图去改革司法,反应多元价值,以及处理毛利民族的议题。譬如 1989 年的青少年司法体系引入了 1989 儿童、青年、家庭法案 (CYPFA),这透过把犯罪者和受害者

的家庭带入一起开会的机制去让青少年犯罪可以减少。这样的机制被认为是来自于毛利的哲学,强调集体责任和社会关系。但是,毛利人的青少年(10-16岁)犯罪比例还是增加之中,占了62%的青少年起诉案件。

有些研究者指出这样的双方家庭开会机制没有改变国家司法的根本哲学,反而国家权力继续施加社会控制。Juan Tauri 说家庭成员开会不是一个毛利的传统,只有部份毛利人这样做。他认为 CYPFA 本身被 Jackson 的司法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所影响,而该过程纳入了毛利人的元素是因为毛利组织的建议。然而他也说,虽然毛利传统有些已经纳入官方制度中了,家庭团体开会的机制不是毛利民族的传统。

发展有意义的分析和批判已经是社会科学学术中的毛利民族的关怀了,这需要检视我们如何研究毛利族群的社会情境。我们许多人都支持原民民的发展,就是 Linda Smith 的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就影响了毛利人许多,也影响了其他学者去研究那些正视原住民经验和知识的理论与方法。同样地,我们许多人希望可以发展一个批判的原住民犯罪学,可以肯认毛利民族的经验以及其对于犯错与社会伤害的概念。

若要超越国家对于犯罪侦防的官方响应,像是扩建监狱,那么就必须响应和考虑毛利人的社会现实。类似地也需要社会理论家去和原住民交流去形成一个解放的研究纲领。为了建立一个原住民犯罪学,必须要关注加害行为的各种相关元素,还有社会伤害的集体经验。也必须去检视国家和刑事体制在社会边缘化和原住民受刑人的大量比例的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原住民犯罪学也要试图去纳入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的经验,超越官方的犯罪控制架构,超越国家定义的议题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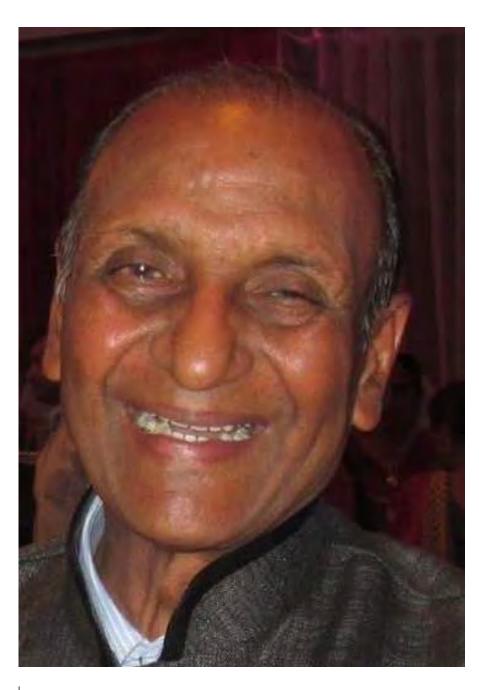
新的取径应该更加关注殖民性、制度性种族主义、系统暴力如何控制和边缘化原住民。毛利学者像是 Tracey McIntosh 和 Khylee Quince 的研究已经指出关注毛利女性受刑人和与代间受刑与受害有关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原住民犯罪学必须要和毛利的经验互动,

包括分析社会有害的犯和相关的社会结构条件。基本上,这也可包括研究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研究国家和其他掌权团体对于毛利民族的的伤害。在解殖民的方向上,目标就是培力毛利社群,增加对司法体系的权力,并且从毛利的价值观出发。■

来信寄给 Robert Webb <robert.webb@auckland.ac.nz>

>醉心于休闲研究



Ishwar Modi.

用 是 5 月 23 日星期二的早晨,在印度的Ahmedabad,我收到了B. K. Nagla 的电话,被告知Ishwar Modi 教授过世的不幸消息。他享年 76 岁。有些人并不会因为过世而消逝,包括了想法、记忆、情感等都会永远存在。Modi 教授就是属于这种人。全球社会学和印度社会学都会记住 2017 年有两位社会学家过世,一位是 D. N. Dhanagre 教授,另外一位就是Ishwar Modi 教授。

Modi 教授于印度位于 Jaipur 的 University of Rajasthan 社会学系开始其学术 生涯的,那时是1974年,我 则晚了两年任职。从一开始 Modi 教授就是社会科学里面最 受教师和学生欢迎的人之一。 他师从 Yogendra Singh 教授, 于休闲研究领域获得博士学 位。其学术生涯有许多成就, 他是印度社会学会的会长, 就是 Rajasthan 社会学会的会 长。于1986年开始了国际社 会学的生涯,因为那年的 ISA 世界大会在 Delhi 举办。他带 动了许多师生去参加世界大会 和其他的国际会议,并鼓励年 轻学者加入 ISA。

Modi 教授深深地献身于 把全球社会学知识带到印地 语社会学之中。他有策略地编辑 ISA 的杂志《全球对话》, 因为这是任务也是挑战。他和 团队总是平等也民主的合作。 因为我不是个有纪律的人,许 多次印地语的《全球对话》都 拖稿了,但是他总是谢谢我。 他也很感谢其他编辑,包括 了 Rashmi Jain 博士,Jyoti Sidana 博士,Prabha Sharma 博士, Dr. Nidhi Bansal博士,和 Uday Singh博士。另外他也大大贡献给了印度社会学会出版的期刊,这是一份有水平的定期出版期刊。所有这些Modi教授的贡献都对印度的社会学师生来说影响极大。尽管他过世了,我希望一切都会进行下去,包括印地语的《全球对话》也会继续出版下去。

其对于教师运动等的投入也让 他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和批判 社会学家。

Modi 教授的仁爱也会被永远记住。他和他的家庭用爱、 关心、尊重对待每一位客人, 就像在休闲时轻松自如自己的 家人一样。

Modi 教授的过世对于其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个损失。社会学失去了他,但是其精神长存。再见了,Modi 教授,社会学界会很想念你的,你也会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Rajiv Gupta,印度社會科學 會會長

> 鼓舞启发人 心的源头



Ishwar Modi在家乡Jaipur。

I shwar Modi 教授于 2017年 5月过世了。他和癌症抗战了很久。生病期间他仍然继续支持并指导印度社会学家,培育新生代的休闲社会学者。他的过世是印度社会学、休闲社会学、整个学术界的损失。

Ishwar 加入 RC13 (休闲 社会学)的时候就已经是该 领域的著名学者了。他被鼓励 去担任 RC13 的会长,度过变 迁的年代。他充满了活力和知识,去吸引了许多人的加入。担任过好己任的会长的 Ishwar执行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写了许多专书和编辑了许多书籍,最后一本编辑的书是Leisure,Health and Well-Being,在今年 4 月出版,与两位其他 RC13 的会员合编。担任 RC13 的会长的时候 Ishwar也是 ISA 执行委员。

在 RC13 和 ISA 之外,

Ishwar 与两个平行的发展相当投入。他被选为世界休闲娱乐协会(现在称为世界休闲,World Leisure)的理事,这是国际休闲专业的最大组织。此外,他也被该组织所尊重,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第二个发展是其参与印度社会学会,在2015年得到了终身荣誉奖,感谢其推动印度社会学,并且贡献于世界级一流的研究与教学之中。

当他过世的消息传到RC13的时候,悲伤的情绪多少被会员间彼此分享的回忆和感恩冲淡了些。每个人都有个可以诉说与Ishwar 有关的故事,而且都是一段长久关系与友谊的

故事。从 RC13 最年长到最年 轻的会员都有此感觉。Ishwar 是我们的前会长,是我们的导 师, 也是我们的老师, 致力让 我们感觉到受欢迎。Ishwar 让 我们的决策、ISA会议、期中 会议等有了包容的基调,我个 人很珍惜他在 RC13 的时光, 也总是对他的鼓励感到感激 不尽。我第一次在匈牙利遇见 他,那是一次RC的其中会议, 在那之前我们用电子邮件通信 过了。我想我就和其他的会员 一样,很伤心并不能再见到他 了。但同时,我想我们也都很 高兴 Ishwar Modi 的精神已经 永远与我们同在。■

Karl Spracklen,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英國, ISA 休閒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副會長與執行秘書 (RC13)

>介绍土耳其编辑团队

Gül Çorbacıoğlu和Irmak Evre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们的团队在 2015 年 1 月加入了《全球对话》的编辑阵容。我们主要是由两位位于土耳其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博士候选人所组成,他们分别是 Gül Çorbacıoğlu 和 Irmak Evren,另外,Ahmet Seyhan Totan 这位好友也帮助编辑和设计的部份。

可以和最新世界上的社会学辩论跟上脚步,然后翻译成土耳其文,这令人相当雀跃,但也相当有挑战性。这份工作不仅仅是翻译而已,我们必须要把英文版的 Global Dialogue翻译成土耳其文的 Küresel Diyalog,要确保整份刊物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整个过程从收到英文版的文章开始,然后,首先我们先分配文章,把类似主题的文章归类,或是关于相同国家的文章分成一类,也按照我们个人的兴趣去考虑,以求可以最大化个人的投入努力。然后我们必须努力在截稿日之前完成。作为两个人的团队,是需要许多的毅力和责任感的!

一旦我们其完成翻译之后,我们会交换然后校对。我们相信第二次的校对,也就是作为一的读者而非翻译者,可以从一个观众一社会学者或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的观点去看,当我们发现有不好翻译的字词时,又深怕直译会

不够到到位,我们会查询土耳其的相关文献,或是跟我们的教授请益,看看是否这个词已经有翻过,没有的话又该如何翻译。当可行的时候,我们会用土耳其的俗语让文章更生动传神。而最后翻完,包括图片解释之后,我们会把稿子给 Seyhan,她是版面编辑的专家。编辑完稿后,我们做最后确认。最后,我们骄傲地产生了新的一期的 Küresel Diyalog!

一旦ISA的网站刊登之后,我们就会把这消息传散出去,给我们大学里的同事和对全球社会学有兴趣的团体。翻译《全球对话》的土耳其版让我们接触到新的议题和社会。并且每一期我们都和高兴地和土耳其的社会学社群一起分享我们的兴奋和热情。■



Irmak Evren 从 Istanbul 的 Bilgi University 得到经济和管理学士,然后从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也取得学士。她然后在法国的 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 Sorbonne 工读经济学研究所,以及 Istanbul 的 Galatasaray University 攻读媒体传播研究所。现在则是在土耳其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攻读社会学博士。其研究恐伊斯兰现象和于法国的跨国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组织,她也是 Istanbul 的 Okan University 的电影学系的讲师。



Gül Çorbacıoğlu 从 Istanbul 的 Bilkent University 取得国际关系学士,以及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取得社会学硕士,现在于同一所大学就读社会学博士班。其论文是有关土耳其医疗专业自主性的转型,部份研究是在英国的 University of York 担任访问研究员所进行的。目前她也是 Bilkent University 的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讲师。其兴趣的领域是医疗社会学,专业知识社会学,工作与组织社会学,性别研究。

来信寄给 Gül Çorbacıoğlu <<u>gulcorbacioglu@gmail.com</u>>

Irmak Evren < irmakevrenn@gmail.com >